



2012年“蛟龙”号7000米海试圆满成功,也印证了翁震平当年的预言。而这还仅仅是702所正在进行的海洋装备研究项目之一,在“蛟龙”号的基础上,翁震平还规划建设深海移动工作站,“它能载更多的科学家,能比‘蛟龙’号的工作时间更长”。

翁震平：追梦海洋强国

■本报记者 吴益超

2013年7月19日,在圆满完成南海第一航段任务之后,“蛟龙”号潜水器从厦门再度扬帆,迎来一次长达两个月的远征,以完成赴东北太平洋进行科学考察及试验性应用航次二、三航段的任务。

望着“蛟龙”号在雨中渐行渐远的背影,中船重工702所(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所长翁震平稍稍松了一口气。作为“蛟龙”号主要设计生产单位的掌舵人,针对“蛟龙”号此前7000米海试中存在的问题,翁震平在过去的一年里刚刚带领702所的科研人员们,完成了一场漂亮的优化升级攻坚战。

翁震平是“蛟龙”号屡次顺利出海深潜及702所其他重大科研项目中绕不开的一位功臣——大到搞所里的科研体制改革、确定科研方向以及整合相关资源,小到不拘一格降人才,为科研项目的宣传、推广与合作而奔走于全国各地。为保障702所科研方向顺利前进,翁震平鞠躬尽瘁。

对他来说,702所寄托了自己怀揣了多年的梦想,一个有关中国海洋装备事业的梦想。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他有过荣誉也曾有过失落,翁震平却选择将这些统统抛诸脑后,一心一意搞海洋装备科研。

沧海横流间,印刻了翁震平对待海洋装备事业的坚毅态度。

“远”与“深”

就在此番“蛟龙”号再次远航的一个月前,《科学中国人》杂志刚刚评选出了年度科学人物,翁震平与院士王小谟、薛其坤等人一同当选。

但翁震平似乎无心留恋这一殊荣,刚刚结束北京行程的他,立刻返回了位于江苏无锡的702所,在组织了深海装备发展研讨、布置了绿色船舶研究等一系列工作以后,随即动身前往国外作技术交流,而在7月19日“蛟龙”号出海前他又在厦门忙碌了一个星期——连续一个多月,翁震平的工作几乎没有间断。

翁震平并不算太年轻,他敢于这样“拼”的理由简单且实在:为了建设海洋强国。

“无论是从近代历史上看,还是从我国的现实需要来讲,建设海洋强国都是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年国家海洋局在江苏召开“建设海洋强国座谈会”,翁震平是唯一一个从不靠海的城市来的参会代表。

建设海洋强国应“强”在何处?技术人员出身的翁震平坚信海洋装备的强弱,对一个国家的海洋实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他的海洋装备科研哲学中,“远”和“深”是最重要的两个字。

“如果我们国家的海洋装备能够在远海运行自如,在深海也潜行自如,那么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我们的海洋权益、和平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海洋强国就不仅仅是一个梦想,而是现实的现实。”

从21世纪初开始,全球船舶工业重心逐渐向中国转移,中国船舶制造业也一片大好。在这一时期的2007年,翁震平走马上任702所所长,当时的他清醒认识到,在中国从造船小国成为造船大国的过程中,702所发挥的作用很小,但这并没有打击到他的信心,翁震平对同事说:“接下来,702所必须在中国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的转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并非一句空谈,成立于1951年的702所,有着一代代海洋装备拓荒人传下来的科研理念以及一大批先进的科学实验设施:有我国规模最大的深水拖曳水池、我国惟一可在稳定回转角速度下进行模型水动力参数测试的大型旋臂水池等20余座国际一流试验设施和两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检测中心,这些都是翁震平的信心来源。

2012年“蛟龙”号7000米海试圆满成功,也印证了翁震平当年的预言。而这还仅仅是702所正在进行的海洋装备研究项目之一,在“蛟龙”号的基础上,翁震平还规划着建设深海移动工作站,“它能载更多的科学家,能比‘蛟龙’号的工作时间更长”。

同时,为了让耗能更低、跑得更快的船舶更多,更远地在中国各个海域航行,翁震平和702所的研究员们马不停蹄地进行有着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船舶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如果有一天北极海运航线开通,中欧之间的海运成本将大幅度降低,为中国研发出能够承担这一任务,又符合节能减排绿色标准的船只,也是我们所的目标。”

丹麦航运公司Nordic Bulk Carriers就曾于2011年尝试“破冰”北极航线,该公司称,经由俄罗斯北部向中国运货的成本,比取道苏伊士运河降低三分之一,航行时间也缩短



记者手记

“我恐怕连及格都算不上”

自6月22日《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后,记者就不止一次地向翁震平提出采访的邀请,尽管他已欣然应允,但电话那头的翁震平,总是没能有太多空余的时间,“很抱歉,这两天我正在外地出差”是他常有的回复。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7月28日,记者才终于得以在两场会议的午休空隙间采访了翁震平。而那天正是星期日,持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的翁震平,还是没能迎来放松的周末。

但采访当日,记者并没有从电话中听出翁震平太多的疲惫,一谈起海洋装备事业,他就像一个关不住的话匣子。

翁震平总是很乐意同别人交流,无

论是所里的科学家,还是上级领导,以及普通市民——刚刚在厦门送走“蛟龙”号,翁震平就来到上海“新民科学咖啡馆”做科普。

“一个法国埃菲尔铁塔的重量约1万吨,水下7000米的压力约12万吨。也就是说‘蛟龙号’突破7000米,相当于拖着12个埃菲尔铁塔在海里活动。”在翁震平眼中,推广海洋装备事业不需要区分宣传对象,“与不同的人交流,收获也是不同的”。

“您为自己6年的所长工作打几分?”采访的最后,记者问翁震平。

“我想,我恐怕连及格都算不上,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他还说,国家对海洋装备事业的重视,就是自己最高兴的事。

近一半。

“他认准了的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接任702所掌舵人之初,翁震平就立志把702所建成世界一流的船舶科学研究所。但当时的时代需要遭遇旧有体制弊病、思维定式时,新官上任的翁震平很快遭遇了理想照进现实的尴尬。

“对702所这样的一家老科研单位来说,既有好的传统,比如老科学家们扎扎实实搞科研、聚精会神突破技术的精神,但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旧有的体制模式让更多人停留在‘上面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思维定式,科研积极性很差,更别提向外推广相关技术应用。”

初入市场的702所,也免不了像很多进行体制改革的科研单位那样,面临“搞科研如坐针毡,进市场如履薄冰”的困难境地。继续这样下去,702所很可能会在新一轮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被无情地淘汰掉。

在这一背景下挑起大梁的翁震平清楚地知道,必须对702所现有的体制和机制加以改造,“既要保留优良的传统,又要发挥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要素”。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翁震平为702所制定了六个方面的十年规划,涵盖了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发展、管理、企业文化和科技产业。

702所的“科技产业处”就是由他主导成立的部门之一,成立该处就是为了保障科技成果与产业的最优结合。同时翁震平也在所内设计激励机制,让更多的科研人员“走出去”,提高他们对科技成果转化反应能力。为更灵活地应对科研项目,翁震平还努力推动为每一个重大项目专门成立部门,“让这些科研人员一心一意搞研发”。如为响应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有生建设深海移动工作站的呼吁,翁震平就成立了专门的深海移动工作站办公室,直接瞄准应用搞研究。

提拔任用年轻人到重要科研岗位,也是翁震平改革中重要的一环。“既培养了年轻人,又能把新领域发展起来,在翁震平看来,这有着‘一石二鸟’的效果。”

为保证这些年轻人能够准确把握科研方向,翁震平还通过设立行政领导小组和技术

专家小组不时给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年轻人予以保障和指导,确保他们不会在科研跑道上跑偏。

“只要是翁震平认准了的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虽然同事们都清楚他的性格,但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力推进改革的翁震平还是难免遇上这样那样的阻力,但他从不搞一言堂,总是第一时间向同事们解释改革的目的与好处。“对我们这样的研究所来说,创新是唯一的出路,假如不搞创新而是始终停留在某一领域,那么这个单位只能存在于一时,不能长远发展。”

很难想象,这样一家应国防需要而生、长期靠“吃皇粮”生存的研究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没有倒下去,还占据了全国四分之一水上游乐设施的市场份额,成立了多家产业化公司,并在国际船舶新规则的制定上有了话语权。

从技术人员到“外宣专家”

翁震平说,技术难题和体制障碍并非阻碍船舶项目进行的唯一障碍,他和研究人员经常还会面临因他人对项目不理解,从而无法使项目立项以及获得项目经费的问题。

船舶工业被誉为现代工业的集大成者、“综合工业之冠”,为支持这一工业建设,就少不了各个领域的基础性科学研究,但这样的研究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应用,收到实际效果,这也是一些船舶科研项目长期无法立项的直接原因。

但翁震平不这样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实船螺旋桨空泡观测试验就是一直萦绕在翁震平心头的一个基础研究之殇。“这项工作,我们在国内推动了十几年,到现在竟然都没有找到一家船舶单位同意和我们搞合作研究。”翁震平有些激动,他心中更显得焦急,因为这项研究在欧美一些国家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而国内针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则一直仅限于模型试验及理论研究阶段,十分落后。

“空泡发生在各类船舶的螺旋桨、舵、减摇鳍、支架等船体各类突出运动部位,甚至突出船体的管路进出口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空泡,很容易引起船体严重振动、噪声以及剥蚀等后果,为了进行这类研究,少不了

实船观测。”

这样的尴尬,甚至曾发生在今天广受关注的“蛟龙”号身上。在702所有着30多年“工龄”的翁震平,见证了从1992年开始论证,到2002年正式在科技部立项的10年间,所里前前后后无数科研人员在背后作的艰辛努力。

但他并不是一个只会等待的人。面对这些问题,翁震平选择了主动出击。

以实船螺旋桨空泡观测试验为例,就在一个月前,702所同德国一家船舶公司展开合作,终于成功地进行了试验,为下一步开展空泡和空泡脉动压力相关性分析提供了宝贵的试验资料。

技术人员出身的翁震平,似乎是702所里观念转变得最快的人——他自言已经习惯了奔走全国各地为一个认准了的项目做推广、搞宣传,让他人了解某一基础研究或科技项目的重要性。“大量的技术细节,只有通过不断地宣传、解释,才能让人明白它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推动它向前进。”

彼时的翁震平,用“外宣专家”来形容并不为过。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到成熟稳重的科研机构掌门人,翁震平经历了国内对船舶基础研究从轻视到重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反复宣传基础研究重要性的他,曾不止一次地受到过冷遇,他也曾感觉到“失落”,也曾困惑于“为什么就没人愿意重视一些基础研究”之类的问题,但翁震平从未真正放弃过,他清楚地知道就算基础研究的推广很难落实,“但终究还是要做的”。

“想要取得科技进步,确实相当艰辛,相当艰辛啊!”回望当年,翁震平连发感叹。

“我是国家培养的”

1982年,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的翁震平,人生首次事业扬帆就是在702所。30多年过去,翁震平同当初一样,依旧是个有着一股子韧劲的人。

初来乍到,这个搞自动控制研究的年轻人,发现702所其实是一个主要以力学研究为主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和本专业不相符的地方工作,将来会不会对自己的事业前途产生影响?

翁震平并没有去想这些,而是很快作出调整,并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搞工程研究需要大量的实验,这就离不开控制和测试,这不正是我的老本行吗?”

上世纪90年代初,他被送往英国国家工程实验室学习控制和测量技术,由于在这里参与的是具体实验项目的控制和测试研究,作为技术人员的翁震平就很难在论文上取得成果——在很多研究人员眼中,论文是衡量一个人科研成果的重要依据,对一个进入研究所工作了快10年的人来说,如果能在英国取得成果并发表一些论文,自己一回到单位很可能会“青云直上”。

但翁震平依旧没有去过多地考虑个人得失,反倒是沉下心来,仔细观察英国的实验室究竟用了哪些现代的新测试技术,哪些对702所的实验测试有借鉴意义,可以被带回国。例如英国在当时就已经很注重船体结构强度的长期监测,1993年翁震平一回到国内,就力主推动这一监测工作的进行,尽管当时国内还没有太多人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1999年从荷兰学成归来,翁震平依旧保持着几年前在英国的“习惯”:不发表论文,而是趁着翁震平正在建设新型实验设施的机会,加紧了解对方究竟建设了怎样的新式科研基础设施。这一次,他带回了三维造波机的技术理念。7年后,世界上最先进的三维造波系统在702所安装调试成功。

难以想象,如今的702所所长,就是因为当年没有发表太多论文,曾两次申报所里的研究员未果。在别人看来,没有发表过太多学术论文的翁震平,“学术水平肯定不怎么样”。

但真正和翁震平共事过的人都知道,在推动702所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翁震平功不可没。而这个事业心很强的男人,总是把工作放得很高,个人荣辱得失放得很低,“我是国家培养的”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成为所长后,翁震平似乎更忙了。最近他又盯上了可燃冰,尤其在听到日本已经实现了在海底开采可燃冰技术后,他又再度扮演了“外宣专家”的角色,向相关部门提建议、做宣传——在“建设海洋强国座谈会”上,翁震平建议由江苏牵头成立可燃冰开采公司,形成一个从开采到运输、销售的产业链。

在翁震平看来,有着深海装备研发优势的702所,应该在海洋资源的开发上有所建树,“如果成立一个可燃冰开采公司,我这个所长宁可不当了,再到国家的能源产业发展中去贡献点力量。”

Opinion

记者眼

状元不是“奇货”



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北京大学招办近日表示,在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阶段,北大明确拒绝了少数试图向北大索要巨额奖金、进行讨价还价的所谓“状元”。

这件事的深层背景,是过去几年内地各省市高考状元屡屡被大陆地区之外的高校,特别是香港地区高校以高额的奖学金吸引走。7月29日出版的《齐鲁晚报》统计:自2005年起,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纷纷以高达四五十万港元的全额奖学金延揽内地省市状元,至2007年的三年间,已陆续从内地“抢走”30位状元。

相比之下,严守教育部相关规定的北大反倒显得有些“落伍”了。尽管这所大学已于2008年将新生奖学金由2万元提高到5万元,但较香港高校仍去之甚远。

虽然高校用奖学金来招揽高分学子已不是什么新闻,学生也拥有选择学校的权利,但招收状元也不应成为学校的“政绩”,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理应在教学实力上下足功夫,而不是靠奖学金走所谓“市场化道路”。

同时,表面上看似是状元自己的选择,实际上往往是家长在背后“垂帘听政”,换个角度看,状元仿佛已成了可居的“奇货”,只等“买家”鉴赏。用奖学金多寡来选择一所学校的方式,恐怕已与教育的精神相背离。

被“山寨”的陆生

陆生回大陆找工作,被面试官问得不知如何作答:台大是指台北大学还是台湾大学呢?台湾怎么会有清华,山寨的吗?(7月26日《南方周末》)

恰逢陆生赴台毕业元年,《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自然显得十分应景,台湾媒体如《联合晚报》等,也纷纷转载此文。伴随着当局“三限六不”政策影响,陆生纷纷返回大陆就业,却又碰上“史上最难就业年”,这样的尴尬相信没有人愿意遭遇,因此台湾高校在大陆招生连续三年保持不高的录取率,也就可以理解了。

尽管大陆用人单位对台湾地区高校缺乏了解,但其实从深层次剖析,折射的是单位唯名校至上的用人逻辑。而作为当年积极倡导陆生赴台的教育主管部门,既然已经得知此类状况的存在,且在台湾地区逐步放开陆生各种限制仍需一定时间的现实语境下,理应对陆生的就业问题有所担当,而不是仅仅将这些学子视作两岸教育交流的“试验品”,对他们的前途不管不顾。

一个好的开端,才能有好的结果。主管部门希望教育交流活动能给两岸交流带来良性影响,就应有所行动,让这样的“负面”新闻少一些。否则曾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陆生赴台恐怕只会一冷再冷,终成一纸空谈。

“最开心的不是得了什么牌子什么名次,而是和你并肩站在了最后的领奖台上!”

在近日落幕的第45届IChO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的4位选手获得了3金1银的好成绩。

中国学子的奥数成绩原本并不引人注目,但此番特殊之处在于前两名的选手是一对情侣,而女主角还在微博上对获得冠军的男主角发出了上述“告白”。

7月25日,这场恩爱秀的两位主角迅速成为新浪微博上的热门话题,网民纷纷发来“贺电”,并借机“悼念”那个属于自己的青涩年代。有网友感叹:“这才是人生赢家啊!”而一些媒体亦跟风评论:被视为洪水猛兽的高校爱情,被学霸们完美“逆转”。

但在笔者看来,“学霸爱情”虽羡煞旁人,但冷静思考,就会发现学业成就与感情基础并无逻辑关系。学业成绩之外结出感情果实纵然可喜,而个人的前途命运对谁都是未知,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还应对感情和学业的辩证关系持一份理性。

媒体和网民按照既定社会价值观,过度拔高“学霸爱情”,将感情观与学业观混为一谈,恐怕只会给对高校原本单一的价值观带来不必要的刺激。

(吴益超)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